

穿行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个学生与两位老师的电子通信

袁明 张小明 李巍

作者简介: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李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政编码:100871)

编者按: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和现实在国际关系学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本刊特别刊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张小明教授和李巍同学的电子通信,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希望借此激发各位读者对理论的研究兴趣。

十一月二十九日

张老师:

您好。昨天刚刚参加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一个包括京城几乎所有高校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学术论坛(南开大学也有代表参加),会上所见所闻,引发诸多感受,想与您聊聊。

昨天论坛的主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困境与出路”,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其他理论共四场。点评人是张睿壮、秦亚青和阎学通三位老师,社科院的一位博士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大部分都在这儿了。三位老师不约而同的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感慨:没有想到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讨会居然吸引了这么多研究生来参加,可见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真是后继有人、大有希望。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一个纯粹的理论研讨会也能聚集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社科院、外交学院、北广、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等六七十人参加。我以前一直以为,理论在中国总是曲高和寡的。

四场研讨会共同11个主题发言人。我作为北大唯一的主题发言人,是仅有的三名硕士生之一,其他的全都是博士生。这让我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有点班门弄斧甚至不知天高地厚之嫌,所以我在发言之前表达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和各位博士师兄师姐们共同探讨理论问题,实在是诚惶诚恐。作为一个刚刚入门的硕士生,我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远没有大家深刻,理论的素养需要时间的积累。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向各位学长们学习如何做理论研究。”这决不是客套话,而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发言的题目是:《NATO、WTO、EU:权力?制度?观念?——冷战后制度主义者的困惑》。

我首先回顾了现实主义、制度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对国际制度变迁的动力的不同解释,然后以 NATO、WTO 和 EU 在冷战后的制度变迁为案例,比较了三大范式在解释国际制度变迁时的优劣,进而得出结论,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时面临着理论上的困惑,这使得传统的制度主义阵营产生了分裂,一部分回归到现实主义,另一部分倒向建构主义。

还好,尽管起初难免心情忐忑,但无论是在主题发言还是中间的自由讨论中,总算没有太给北大丢脸(张睿壮老师和秦亚青老师都对我的发言和讨论给予了肯定)。事后还有一些兄弟院校的同学通过电子邮件继续和我讨论。

但这次论坛,我们学院博士生的缺席却让我感到迷惑不解,按理说他们才是这次研讨会的主力军。清华有三位博士参加,社科院、外交学院和人大都有两位博士代表。此次活动的主办者清华国际所陈琪老师在会间跟我私下聊天时问我:你们北大的博士现在都在做些什么研究?我们发了很多邀请函,怎么连一个博士都没有回应?

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研讨会,给我们这些研究生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会场上气氛热烈的讨论,甚至观点的针锋相对(当然我们的思想还显稚嫩),特别是三位老师的精彩点评,给我上了一堂非常好的国际关系理论课。

参加这个论坛之后,我的另一个突出感受就是,兄弟院校的学术水平真的进步很快,尽管有些同学不掩对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羡慕,因为我们院规模最大,历史最久,门类最为齐全。但是在我看来,兄弟院校的学生在对待学问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扎实和认真态度(从他们的发言和中间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来)却让人肃然起敬,甚至令我们汗颜。而我感到我们院的研究生还比较缺乏一种研究理论的氛围。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对一些国际时事的热点追踪当中,对理论缺乏应有的关注,这跟那些新闻时评家没有什么两样。当然,对国际时事进行点评,也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我觉得真正代表一个学校某一学科水平的是它每年不停推出的博士论文,因为博士论文往往代表了最新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纵观最近两年全国兄弟院校出版的好几本比较优秀的博士论文,不得让我们产生一种忧患意识。看看别人在做什么,然后再对比自己,就足以感受到:在全国各个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激烈竞争中,我们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和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于人。

这次论坛不由得让我产生一种警钟长鸣的紧迫感,学术进步的一个很大动力也在于学术研究者之间的竞争,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决不能成为这场学术竞赛中的一个落伍者。

以上便是我昨天经历之后的一些感触。其实这些想法有的早就长萦胸怀,只是今天借这个机会,与张老师聊聊。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学生:李巍

十一月三十日

李巍:

谢谢你信任我,来信谈了你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也愿意就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供你参考。

你最近参加的那个会议表明,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已经开始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并且能在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上表述自己的想法。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它说明经过 20 多年的发

展和积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记得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当我还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本科的时候,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陈乐民先生 1981 年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少得可怜,而且读起来十分吃力,因为那时的知识积累很少,外语水平也不高,难以阅读国际关系理论原著。在我的印象中,我听的第一堂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课,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所做的一个讲座,他介绍了博弈论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我读的第一本中国人写的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是陈汉文先生于 1985 年发表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浅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说实在的,不管是在听课,还是在阅读中,我都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虽然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但是没有把它当作自己关注的重点学习和研究领域,更不敢轻易写这方面的学术论文,特别是不敢写纯理论的文章。我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和参考书开始逐渐多了起来。那时,我们系已经有老师开设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也有外教来讲授相关的课程。记得是在 1987-1988 年间,国际关系研究所邀请了美国几位著名学者(包括 John Ruggie, Miles Kahler, Peter Gouretitch)来给学生讲授国际关系理论。我听了这些美国学者的课,并且同 John Ruggie(后来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助理,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交往比较多,他回美国后还给我寄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这本书,而且希望我把该书译成中文。但老实说,当时上他们课时,感觉听得太不懂,因为难以理解很多概念。我更没有勇气去翻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这本书,好在该书的中文版已经于 2002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只是在写作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有意识地借用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积累太少。

实际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知识不断得到积累的过程,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外来的东西,把它引入中国,更需要一个逐步吸收和消化的过程。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再是让中国学人感到陌生的学科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的代表作或者经典教科书很多已经被译成中文并出版,中国学者也出版了一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最近 10 年来,我参加评阅了校内外很多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感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论文明显增多了,而且大多数学生在写作学位论文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有意借助理论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研究生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素养比当时的我要强得多了。当然,总体来说,这门学科目前在中国还很不发达,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信中所谈到的理论研究气氛不够浓厚的问题,我也有同感。2000 年在我院科研研讨会上,我曾经做了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言,谈了我院在国际关系理论上面面临着来自兄弟院校的强大压力之事实,希望我院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关注这个问题,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我院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与教学水平,后来这个发言稿经修改后发表在 2001 年的《欧洲研究》杂志上。近年来,我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开设的基础理论课程增多了,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出版的理论著作与译著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对理论问题感兴趣了等等。然而,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其中原因很复杂,包括我们作为老师在课堂上引导不力。不过我想,这种局面是较长时期形成的,要想尽快解决,需要魄力和激情,以及持续的努力。特别是理论研究,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出的成果,而且也较难得到研究基金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激情和毅力,那么是不可能把这样的工作不断推向深入的。

另一方面,我也相信我院今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教学会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因为,在国

际关系理论教学和研究方面,我院具有很好的基础。我院的前身北大国际政治系是国内最早开设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的单位。早在1983年,李石生教授就接受创建并开设“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课的任务,他在讲授该门课的过程中,还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他的这些论文收集在2003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学探索文集》中)。章亚航教授也开设了主要以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理论为主的课程,并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他还翻译了波兰著名学者库库尔卡所写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一书(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王缉思教授也属于较早开设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课程的学者,他上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可惜后来他离开北大了。梁守德教授在倡导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我记得贾庆国教授1987年来北大任教后也讲过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光从课程设置来看,从1983年到今天,我院一直都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课程,特别是目前有几位中青年教师在讲授这样的课程,很多老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都与国际关系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不少国际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来我院讲学或访问,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理论研究的发展动向,并且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我相信,今后只要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加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行列,以及我院加大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我院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教学方面的水平一定会迈上一个新台阶。当然,正如你在来信中所提到的,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否则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于人。我最近在根据2005年的版本修订《理解国际冲突:理论和历史》这本译著,也正是想为中国学生提供一个比较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材,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理论学习和研究的行列。

最后,我希望你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能够持续下去,并且希望我院有更多的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在这里,我想给你提几点建议(这实际上也是我自己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认识):

第一,注意对现有理论的消化与吸收。这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正在做的主要的工作。最近20多年来,国内出版了一批国外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大多数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现在国外最新出版的理论著作很快就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我院的教师和学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比如,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丛书中,有多部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是由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翻译的。近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东方编译所译丛”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所推出的国际关系理论译著中,有多部是由我院教师翻译的。除了译著之外,中国的学者也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专著和教材,其中也有一些是我院教师或博士研究生的作品。

应该说,现在的学生可以看的相关参考书还是不少的。但是,我在这里想指出一点,即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学生最好读原著。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外来的东西,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无法做到十分完整与准确地表达作者的原意,很多理论概念的翻译很不统一,也难以做到绝对的准确。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一些译著读起来比较费劲,不如读外文原著舒服。你们已经具备了阅读原著的外语水平,理应多读一些原版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特别是那些经典作品。北大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就给大家提供了不少原版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著作。

第二,努力把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与对国际关系实践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关系实践的抽象描述与概括。如果我们不重视相对具体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话,那么是很难理解比较抽象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意识地运用现有理论去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以及通过历史

与现实的个案分析,来证明理论观点正确与否。我感觉国内国际关系理论界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特别是很少有人愿意有意识地借助理论工具,进行扎实和细致的个案研究。《史学月刊》今年初要出一个探讨如何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结合起来的专栏,其中将刊出我写的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的文章。我相信,以后这方面的著述会越来越多。

第三,善于从其他学科吸取养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同其他学科是密不可分的。很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建立,都是因为从其他学科中得到启示,同某个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人,必须关注其他学科,并且善于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分。我想,我们除了要多读哲学、历史学、国际法和政治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外,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相关知识。正因为如此,我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因为该读的书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不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否则不仅无法理解现有的、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而且也难以在理论的构建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以上谈的想法,仅供你参考。

张小明

十二月十四日

李巍:

你好。张小明老师给我转来了你的一封信,我看了很感动。

我个人并不搞理论研究,因为有点自知之明:我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太差,搞不了,但是我一直相信,如果没有理论的高度(尽管衡量高度的尺子不一),是很难有学科上、学问上的大发展和大成就的。

我想谈几点个人意见,供你参考。

第一,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目前尚在起步阶段。有两个基本点是无法绕过去的,首先是对西方(欧洲、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史、流派有第一手的深入了解;其次是对中国自身的思想史、外交史、外交实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两点,都须用非常之功,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第二,做理论研究,同做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最重要的是要有研究激情,一种探索冲动。我们通常讲的学术氛围,其实最原始的动力来自人们的内心。北大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教员的研究与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周围同事及年轻学生的思想激发以及继之而来的研究冲动。这种激情和探索冲动是看不见的,但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是人的一种精神需要,没有什么功利的掺杂。记得王缉思老师80年代在北大工作时,给研究生开设过一门课,叫“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当时很受学生的欢迎,但王老师在一开始就告诫大家,做理论研究其实是最不容易出明显成果并与世俗名利最无缘的,换句话说讲,就是要自甘寂寞。王老师去社科院工作后,他的主要工作放到了美国研究上面,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理论上的努力。这只要看他这些年来写的主要文章便可了解。我想说的是,北大在理论建设方面,也有自己的历史。在新的条件下,历史的积淀仍会发挥其作用。

第三,看到你介绍清华会议上研究生们的理论热情,我极受鼓舞。中国年轻学子对理论研究有如此热情,这是中国的希望!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我想也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的文明能产生这种深刻的理论关怀(此处要说明一下,我不懂印度,我想象中,那样的文明也会有自

己相应的理论关怀)。我接触到我们学院的一些研究生,也在想你提出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应当关怀的是世界的发展中的一些基本规律。但是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全球化”与“边缘化”,人们对规律的掌握也仍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讲得直白一点,如果说目前国际上流行一些理论说法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发明这些理论的文明在目前阶段的话语霸权。不过我想,曾被“边缘化”的一些文明现在自己发展起来,只要看清潮流,就会努力建筑自己的平台,努力了解那些目前仍处于主流地位的平台及其基础,争取有朝一日有较为平等对话的机会。我想,“志存高远”,表达的应是此意。

第四,介绍你在寒假中读一本书:《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是英国的两位学者写的,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刘德斌老师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特郑重推荐。

以上意见,是今天重新又看了一遍你给张老师的信后有感而发。不当之处,请见谅。

袁 明

十二月二十日

袁老师、张老师:

你们好。收到二位老师的回信,非常感激。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冒昧之言能让你们在百忙之中给我写这么长的信,读后感受良深。

我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偏好纯粹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以前主要读中文译著,但最近这半年,在袁老师《国际关系原著选读》那门课的引导下,我开始读越来越多的英文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一套影印丛书,对于我们这些不易接触外文原著的研究生来说,可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情),对理论大师的思想进行零距离触摸,更加感受到国际关系理论过去八十多年中经过三次范式大辩论所发展起来的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真是给人一种知识的美感!

但我想,理论的学习决不能离开历史,因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读了袁老师您给我推荐的那本《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之后更觉得理论与历史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的基干。所以小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的前言中说,“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我们必须学会“往返于理论和历史之间”。

当然,我也觉得研究理论和学习历史并不等于不关注现实问题。在《国际组织》5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三大领军人物 Peter Katzenstein、Robert Keohane 和 Stephen Krasner 在他们联合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对《国际组织》上发表的文章“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越来越具有‘自我欣赏’色彩”的趋势表达了忧虑,他们甚至指出,“即便是像 John Ruggie 这样的目前正担任联合国高官的学者也并没有试图去将他的理论作品和他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联系起来”。张老师您在信中跟我提到,要把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与对“国际关系实践的研究”结合起来。很巧的是,阎学通老师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也一再告诫我们:进行理论研究一定要有一种问题意识。我想阎老师想要表达的意思跟张老师一样:如果不进行扎实的案例研究,纯粹的理论辩论就会越来越空洞,只有通过对历史的或现实的案例研究,我们才能证实或者证伪某一种理论,进而使理论更加接近真理。

因此,袁老师您在为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我感受特别深:“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

坏。”诚哉斯言！因为国际关系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实践性相当强的学问。

所以，在看了两位老师对我的学习建议之后，我觉得我们研究生的理论学习恐怕要这样：用理论的框架和历史的背景分析现实，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来检验理论。理论、历史与现实，应该成为我们平时学习研究的三只鼎立之足，任何一个也不可偏废。没有理论我们就缺乏判断现实和历史的定向感，没有历史我们缺乏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厚度，没有现实我们便缺乏对问题的敏感性。

我们这一代研究生们非常荣幸地见证了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日新月异的阶段，大量西方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与张老师您所讲述的二十年前做理论研究的艰辛相比，我们现在的条件无疑要好得多。两位老师都在信中提到我们学院理论研究和理论教学的历史，对我们学生而言，这既是鼓舞，也是鞭策。

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然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和吸收，再用理论去研究具体的问题，最后从问题研究中总结出新的理论体系，我想这是建设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的必经之路。引进是第一步，因为作为一个后发的学术群体，我们必须知道别人都在说些什么，在用什么样的方法思考问题，否则凭空是造不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大国，没有自己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是跟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后面亦步亦趋，同样是很可怕的。袁老师您在信中所提到的西方话语霸权，也是我们在研讨会上的一个主要困惑点之一，因为我们越来越开始发现，单纯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乃至亚洲的现实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食洋不化的后果，所以消化、吸收和创造才是我们中国学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研究生）更重要的使命。

袁老师您说做理论需要一种“研究激情”和“探索冲动”，其实潘维老师在一个多月前也曾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学术上的执著信念完全来源于一种理想主义，一种为人类知识的共同体做贡献的理想主义，学术原则与功利思想通常是背道而驰的。”这话曾一度让我惊诧莫名，因为在我看来，潘维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在课堂上通常会不由自主地把那套大国权力政治的思想逻辑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学术态度的理想主义和学术立场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两回事情。

我记得许振洲老师曾说过：尽管现在出版业越来越发达，但在人类的知识系统中，真正闪烁着智慧之光的书籍却增加得非常有限。确实如此，在一个快餐资讯越来越多的年代，更加深感只有在那些学术大师的经典名著中才能找回一点思想的宁静与安详，一点人生的淡泊与从容。

再读两位老师的回信，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一片拳拳之心，更加激励学生勤奋读书。

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学习的建议。提前祝老师新年快乐！

学生：李巍

（责任编辑：王 联）